

# 论抗战后期中英处置香港问题之方略 (1943—1945)\*

孙 扬

**内容提要** 从1943年1月中英新约签订之后到1945年8月英国重占香港之前的两年又七个月是决定香港命运的关键时期。新约签订后,中国并未因此在香港问题上放弃努力,外交上接受罗斯福的建议,拟将香港列为“自由港”以换得主权;军事上则制定了从日军手中夺取香港的作战方案。与此同时,英国成立了“香港计划组”,其工作的重点是在中国军队攻占香港的前提下如何实现重返香港。由于英国态度强硬,中国的外交努力未能奏效。1944年开始,日军在中国大陆的一系列作战延迟了华南战场的战略反攻,日本的突然投降又使得攻占香港的军事行动未及实施即告终止。而英国殖民地部和军方积极筹谋,在日本即将宣布投降之前,派遣舰队登陆香港的决策实质上已基本形成,英国为实现重占香港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关键词** 香港问题 中英关系 中英新约 英国重占香港

1997年前后,中国史学界对于抗战后期香港问题的讨论不可谓不充分,然而,这一领域仍有空间尚待深入发掘。总体而言,前期研究的焦点主要着落于中英新约谈判和香港受降之争两个方面,对于1943年1月中英新约签订之后到1945年8月英国重占香港之前的两年又七个月,中英两国因应形势、制定规划、筹谋决策的细节则较少涉及。<sup>①</sup>而历史的精妙与诡谲之处往往隐藏于细节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后香港群体性事件与港府对策研究(1945—1967)”(12CZS033)阶段成果;亦得到南京大学人文基金项目“香港问题与战后中国政局演变研究(1945—1950)”(LSRWG1023)资助。

<sup>①</sup> 有关这一研究领域,在中国史学界,直接使用第一手文献,且较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似当属刘存宽《1942年关于香港新界问题的中英交涉》、《英国重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1992年第2期),李世安《1943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陶文钊《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以及台湾学者李云汉《国民政府收回香港九龙之决策与交涉(1941—1948)》(台北《近代中国》第119期)和吕芳上《一九四〇年代中英香港问题交涉(1942—1945)》(《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年版)。总体而言,大陆学者多以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为基础,重在重建中英新约谈判和香港受降之争的史实,从英方视角探寻英国重占香港的实施过程。台湾学者则以台北“国史馆”藏档作蓝本,从中方视角阐述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博弈与角逐。除上述研究成果之外,近年来,王建朗等学者利用蒋介石日记,从“大国意识”和“大国作为”的角度检讨抗战后期中国外交的努力与挫折,深化并拓展了战时香港问题的研究空间,参见王建朗《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中,这其中包括:中国政府曾有个“自由港”的方案设计,这个方案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另外,蒋介石所言“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取回”究竟有无着手实施?英国在战时曾设立“香港计划组”(The Hong Kong Planning Unit)等机构,它们如何发挥作用?出兵重占香港的建议是怎样出台的?本文旨在详人所略,综合使用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的档案文献资料回答上述问题。

## 一、中国的外交努力和挫折

有关中英新约谈判中的香港问题,前期研究已比较充分,此处不赘述。1942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决心对英国让步,结束旷日持久的新约谈判。《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批露了蒋介石当天的心境:

晨五时醒后,考虑与英国订新约事。我虽不要求其对九龙问题作任何保留之约言,而彼要求我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果尔,我政府惟有自动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以不承认英国在华固有之权利。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狴,亦必无可如何。此乃为最之手段。如彼无所要求,则我待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sup>①</sup>

这段文字具有重要意义,“领袖意旨”基本奠定了此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对英交涉的逻辑。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至少两层含意:第一,新约签定并不代表香港问题尘埃落定,中方应当在签约之后表明日后重新提起的权利;第二,香港毕竟尚处敌手,且在中国战区之内,若用军事手段从日本手中取得,英国也无可奈何,当然,这是“为最之手段”。这是蒋介石对香港问题设想的“两手”,即一手外交,一手军事,那么,“两手”是怎样运作的?

中英新约于1943年1月11日在重庆正式签署。外交部长宋子文签约当天照会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声明对于香港问题中国将保留日后提出讨论的权利。10天之后,薛穆复照中国政府外交部,声称:“接准贵部长一月十一日关于九龙租借地事之照会。在该照会中,贵部长通知本大使,以中国政府对于此事,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等由。本大使兹答复,并奉告贵部长者:即本大使业已将上述通知转达本国政府矣。”<sup>②</sup>之后,这份照会便石沉大海,英国再没有就此作出任何答复。中国单方面的照会对英国没有丝毫的约束,英国外交官们谈判手段的虚与委蛇,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中国政府幻想的空间,然而这些毕竟没有形成白纸黑字的条约文件,英国从来就没有承诺会对解决香港问题承担任何义务。尽管如此,新约的签订多少又显示了一种收回主权方式的可能性,即通过外交手段,以另订条约的方式冲破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因此,中国政府并未放弃在香港问题上的外交努力。

中英新约签订后两个月不到,一个收回香港的具体设想开始酝酿。1943年1月18日,蒋介石电告正在美国纽约访问的宋美龄,表示“英国与我所订新约不肯提及归还九龙租借地事,实为遗憾”。<sup>③</sup>而此时,宋美龄正利用访美的契机与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积极商讨有关中国在

①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2),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140页。

②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2),第346页。

③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2),第339—340页。

战后收回失地的问题。3月1日,宋美龄发来的电报声称罗斯福的态度是:“关于战后问题,琉球群岛、满洲[洲]及台湾将来应归还中国,香港主权应属中国,但可划定为自由港,朝鲜独立可由中美共同担保。”<sup>①</sup>由此可见,“自由港”方案的酝酿肇始于美国的建议。

3月12日,罗斯福会见了访美的宋子文,再次提出“自由港”的建议。罗斯福说,英国外相艾登(Robert Eden)即将来美访问,美英之间将商讨欧洲善后及战后世界重建问题,届时他将向艾登建议战后英国归还香港,而中国“自动将香港九龙一部或全部划为自由区,在该区内不征一切捐税”。罗斯福还表示:“英经营香港百年,宣布为自由港可保全英侨民一部分权利,此亦中国为建设新世界之贡献。”宋子文回应说,前任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Kerr)在重庆时曾表示英国愿意放弃香港,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也获知英方人士亦有此类想法。并且,新约签订时,英方表示愿意在战后与中国商讨九龙租借地问题。此外,战后香港在军事上已无重要性,若中国严格将其视为外国属地,香港经济“即行破产”。至于将香港划为“自由港”的建议,宋子文说,自己在未得到蒋介石的指示之前,不能表示任何意见。<sup>②</sup>

宋子文于第二天将此消息电告蒋介石,请示对策。蒋介石令陈布雷复电:“元电诵悉,中意香港如英国交还我国后,我国可自动声明以香港(或连旧九龙租借地在内)为自由港当不反对。但不能作为交还香港之条件,必须由我方以自动方式出之为要,惟此须国防会议通过,兹已转该会提出讨论,待决决后当再电达。”<sup>③</sup>3月19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专就此事召开临时会议,林森、孙科、于右任、吴稚晖均对蒋介石的回电表示赞同,会议决议“英如交还香港后,我国可自动宣布香港及旧九龙割让地为关税自由港”。<sup>④</sup>3月24日,外交部将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决议电告宋子文,宋子文于27日转告罗斯福,表示中国政府接受了“自由港”的建议。然而,“自由港”的设想实在是有些一厢情愿,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艾登赴美与罗斯福会晤,他拒绝接受这个建议,该方案就此搁浅。

尽管“自由港”的方案甫经提出即遇挫折,但中国政府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对收回香港进行规划,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外交部欧洲司官员张纪培提交的《香港九龙问题》报告。在报告中,张纪培首先阐明了香港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重要性,在回顾英国侵占香港的历史之后,他指出了香港孤悬海外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及危害。报告的后两部分提出了收回香港的办法和对策。在收回办法中,报告分列甲、乙两案,前者主张一并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后者则提出可先收回九龙租借地,同时加强海关缉私并敦促英方改善香港华侨待遇。两者途径均是与英国进行直接磋商,订立专约,至于谈判的时机、提出的方式等均未涉及。甲、乙两案均主张收回香港后,英方所有的港坞建筑、公共设备及公营事业,皆由中国政府收买或租赁使用,中方并承诺保护英方在华商业利益,协助防止在香港地区对于英方安全之威胁。除此之外,报告又提出“达成目的之方法”四点,归结到一点,就是使用宣传手段,例如“以宣传方法,使英国朝野明了中国民族性,历来爱好和平崇尚道义,是以香港及九龙租借地之收回,有助英国安全及在华权益之维护,暨其商业利益之发展。”“以交涉谈判方式,晓以大义,提请英国政府同意交还”。<sup>⑤</sup>平心而论,外交部的这份报告政治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尽管宣示了政府对收回香港的指向、承诺和决心,却缺乏基本的技术层面的操作规划,事实上,它的命运也只是束之高阁。

①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版,第286页。

②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3),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50—51页。

③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3),第49页。

④ 《国民政府为收回香港事致行政院训令》(1943年3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2(2)/2249。

⑤ 张纪培:《香港九龙问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18/2952。

而开罗会议本可以成为又一个机会,但中国政府并未借此提出香港问题。<sup>①</sup> 蒋介石返回重庆后曾说:“香港问题,本人并未提出。惟罗斯福总统曾向本人表示将香港作为自由港,而将主权归还中国,将来必可办到。”<sup>②</sup>至此,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中国政府再未有使用外交手段收回香港的计划与准备。

## 二、从日军手中夺取香港的军事方案

那么,外交一手如此,军事一手又如何呢? 前述《事略稿本》披露,蒋介石打算“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顾维钧的回忆录中亦有类似记载。<sup>③</sup> 笔者以为,蒋介石的想法可能具有两重含意,其一是单纯从战争角度出发,完成消灭日军,收复香港的军事目标;其二是造成中国军队占领香港的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势必面临重返香港的极大困难。目前公布的资料仅能证明从1943年11月到1945年7月,中国战区为实现歼灭华南日军,攻占广州、香港的军事目标,曾制定相关作战计划,但并无直接资料可证明中国政府准备在占领香港后建立行政机构、收回国家主权。

开罗会议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曾提出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史迪威认为,待恢复中缅交通、运送必需的装备与供给后,即可发动收复广州和香港的军事行动。<sup>④</sup> 1944年,缅北战场进入反攻阶段。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会师芒友,缅北滇西作战胜利结束。但西南交通线恢复之后,收复广州与香港的军事行动没有能够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实施。主要原因是1944年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华南和西南众多战略要地落入敌手,延迟了中国战区反攻华南的军事行动。

1945年2月,军事委员会拟订了《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针对华南战场,作战计划大纲的设想是由美军登陆占领广州和香港,卫立煌、汤恩伯率部攻克宜山、柳州后,以主力向梧州、三水突进,与美军会师西江。但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军事行动迟迟未能展开,加之日军发动老河口及芷江作战,该作战计划未能实施。3月,美军发起冲绳战役,日本参谋本部判断“华南方面不仅对防卫本土的重要程度已大大减小,同时联军在该方面登陆的话,恐怕也不会超出英军夺取香港的范围”,认为“只留下能确保广州、香港的兵力即可”。<sup>⑤</sup> 5月中旬,东京作出实施战略收缩的决策,“中国派遣军”于6月10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命令驻华南部队,即田中久一的第二十三军向广州和香港收缩。<sup>⑥</sup> 至7月中旬,日军在广州及其外围地区驻有3个师团、4个旅团及1个香港防卫队,兵力共约9万人。从中不难看出,冲绳战役之后,日本“帝国门户”已被攻破。日军认为华南地区的战略意义已大为降低,一方面日军开始将华南、西南地区的部队北调华中、华北;另一方面,日军集中在华南的剩余兵力布防战略要地,抵抗盟军登陆作战,力保广州与香港。1945年5月,日军开始从广西逐步撤出,中国军队跟踪追击,于6月30日收复战略要地柳州,为实现歼灭华南日军、收复

① 蒋介石在1943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表示将在开罗会议上提出香港问题,但经反复斟酌,最终决定所有有关中英争端的问题不在开罗会议上提出。有关史实可参见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此处不赘述。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5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826页。

③ 《顾维钧回忆录》中有关于蒋介石这个想法的表述是:“用我们自己的军队收复它。”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6页。

④ 梁敬粹:《开罗会议与中国》,香港,亚洲出版社1962年版,第59页。

⑤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第6页。

广州和香港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7月9日,驻华美军作战司令部负责人柏德诺(Haydon Boatner)准将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提交了一份从速攻占广州、香港地区的作战计划。该计划要点是:盟军从海上登陆雷州半岛,利用湛江港作为补给基地,以主力部队向东进攻广州与香港。<sup>①</sup>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认为此方案过于冒险,在衡阳、曲江、赣州有日军机动兵团的状态下“遽攻广州,免以主力侧背授敌,万一不胜,致招不可挽救之失败也”。<sup>②</sup>

因此,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7月14日制定了《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案》,该方案分三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攻略桂林及雷州半岛,开辟第一海口;第二阶段,攻略衡阳、曲江,为第三阶段作战扫清威胁;第三阶段,攻略广州、香港。<sup>③</sup>攻占广州、香港的具体方案是:“以新一军及第三方面军(欠第二十七集团军)暨另由第三、第七、第九战区抽出之三个健全军担任之,务求在数量上构成优势。”<sup>④</sup>攻击开始时间定为1945年12月1日,具体攻击部署如下:新一军由梧州沿西江两侧地区,攻击广州之西面。第三方面军以主力沿粤汉铁路攻击广州北面。于三、七、九各战区抽出之三个健全军由龙南、河源分道南进,以一部进攻增城、石龙,截断广九铁路,再进而攻击广州之东面,以主力经惠阳、九龙道攻击九龙半岛及香港。<sup>⑤</sup>该方案特别强调,中国军队希望美军在攻占香港的军事行动中能够支援配合:“我军攻击广州、香港时,并希望美军海军参加对广州、香港之攻击,尤希望美军陆战队登陆作战,并派船舰运输掩护五十四军在广州以南各要点之登陆。此外,并协助攻占九龙半岛之我军向香港登陆。”<sup>⑥</sup>

然而,这个军事计划只完成了第一阶段攻占桂林部分,7月17日,中国军队向桂林追击日军,于28日收复桂林。仅仅一个月不到,日本宣布投降,攻占广州和香港的作战方案终止实施。终究,军事攻占香港的计划停留在了纸面上。

### 三、英国重占香港的设想

中英新约签订后,从1943年到1945年,英国政府在多个场合声明不会在战后放弃香港的立场。政党政治尽管提供了讨论和修改对外政策的空间,但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无一例外地主张英国在战后重返香港。艾德礼(Clement Attlee)接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担任英国首相,新的工党政府完全继承了之前丘吉尔内阁的香港政策。当然,强硬的政策还需要周密准备的支撑才能使英国重占香港从计划变成现实,而促使这一过程实现的主要推手是英国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和军方。

尽管中英新约搁置了香港问题,英国政府也从未表示要放弃香港,但日军占领香港的现实和中国收回主权的诉求仍然使得香港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这正是殖民地部和军方焦虑所在,1943年,殖民地部曾试图发起一个跨部门会议,专门负责香港问题,但这个建议被外交部否决。<sup>⑦</sup>在这种情

<sup>①</sup> 《何应钦致蒋介石报告》(1945年7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sup>②</sup> 《何应钦致蒋介石报告》(1945年7月1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74页。

<sup>③</sup>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案》(1945年7月1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78页。

<sup>④</sup>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案》(1945年7月1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80页。

<sup>⑤</sup>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案》(1945年7月1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80—181页。

<sup>⑥</sup>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案》(1945年7月1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85页。

<sup>⑦</sup> 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Great Britain, China and Attempts at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Kong, 1945-195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3.

况下,殖民地部自己于1943年成立了一个“香港计划组”负责筹划重占香港、拟订建立行政机构方案,以及未来恢复殖民统治后的政策规划。起初这个小组只有9名组员,但他们均是曾在香港任职的资深官员。成立的第一年,“香港计划组”还隶属于“马来亚计划组”(The Malayan Planning Unit),但很快便独立建制。到1944年9月,前香港政府华民政务司(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麦道高(David Macdougall)出任香港计划组组长,组员也增加到28人。<sup>①</sup>香港计划组的核心是“民政事务组”(The Civil Affairs Unit),这是一个不公开的组织,对外仍以“香港计划组”为名,它的职能是在英国重占香港后迅速建立行政机构。<sup>②</sup>

除此之外,英国驻重庆大使馆和驻华英军司令部构成了英国政府在中国的情报网,有关香港的信息通过这两个机构传回英国,并递交到外交部、殖民地部和军方的决策层,成为英国内阁判断和处理香港问题的主要依据。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组织是英军服务团(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它于1942年7月经中国政府认可,由赖濂仕(Lindsay Ride)上校在曲江成立。赖濂仕本人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在1928年10月来到香港,受聘担任香港大学生理学教授,同时他也是香港防卫队(The Hong Kong Defence Force, HKDF)成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赖濂仕兼任英军战地医院军医,香港沦陷时被俘,关押在深水埗集中营。1942年1月,赖濂仕逃出集中营,在新界经中共港九大队帮助最终安全抵达重庆。<sup>③</sup>赖濂仕的英军服务团受到英国军情九处(MI9)<sup>④</sup>的战术指导和物资援助,主要负责营救战俘逃离香港和收集情报。其总部后迁至广西桂林,在广东惠州设立一个前方办事处,掌控多条进出香港的交通渠道。其中,1942年设立于新界西贡,代号为“Y”的联络站是英军服务团唯一打入香港的前哨站,为后来英国重返香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sup>⑤</sup>

英国政府为重占香港可谓煞费苦心,相关机构的设置、人员的招募以及预案的制定在1943年以后有条不紊地运作起来,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英国如何重返香港。由于香港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蒋介石指挥下的中国战区,而并非英军统帅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将军指挥下的东南亚战区,反攻华南、占领香港理所当然属于中国战区的责任。然而,一旦香港处于中国的军事占领之下,英国以什么理由,采取怎样的方式重返香港?这个问题令殖民地部的官员们十分头疼。

前述香港计划组及其核心的民政事务组是英国重返香港的关键机构,怎样将其派遣到香港并重建行政机构是核心问题。由于此后的日本投降具有相当的突然性,在1945年8月之前,英国政府并没有预见到日本会很快崩溃。所以,一切重返香港的计划都基于一个前提——中国军队(在美军的协助下)将攻占香港。殖民地部的难题在于,在中国军队反攻香港的预期中,如何在不引起中方注意的情况下,将英方相关人员派遣至香港,并成功实现重建行政机构、恢复英国统治的目标。殖民地部一直在寻找重返香港的契机,1945年春,来自于重庆英国大使馆的一系列电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945年4月11日,驻华大使薛穆在给伦敦的电报中透露,驻华美军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奥姆

<sup>①</sup> 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Great Britain, China and Attempts at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Kong, 1945 - 1952*, p. 13. Frank Donnison,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the Far East, 1943 - 1946* (London: H. M. S. O., 1956), p. 139.

<sup>②</sup> Future Operations in China, Colonial Office views ref. J. P. (45) 200 (S) (T. of R.), CO 129/591/15, pp. 4 - 5. 英国殖民地部档案(缩微胶片),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原件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文中引用的CO 129系列档案出处均同此处,不再注明。

<sup>③</sup> 赖濂仕在战后出任香港大学副校长,1977年10月病逝于香港,他的经历可参见Edwin Ride, *BAAG, 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 - 1945*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sup>④</sup> 军情九处(MI9, 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9)成立于1939年,其主要职责是援助敌占区的抵抗组织以及掩护和协助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和战俘逃离敌占区,1941年之前还负责对敌军战俘的审讯工作,该部门于1945年撤销。

<sup>⑤</sup> Edwin Ride, *BAAG, 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 - 1945*, pp. 85 - 96.

施特德(Brigadier Olmsted)准将建议薛穆为他的部门配备一名英国军官,以便处理重占中国港口城市时面临的经济接收问题。因为,战前英国在华资产巨大,尤其是在中国的港口城市。中美两国军队占领这些城市后需要对这些资源和设备进行处理,按规定,平民不得参与此事,因此奥姆施特德希望能有一位具有中国事务以及经济方面经验的英国军官作为联络官协助他处理相关事务。薛穆向外交部表示这是一个保护英国在华资产与利益的机会。<sup>①</sup>第二天,薛穆再次致电外交部请求他们考虑这个建议,他认为联络官合适的人选是具有丰富的中国经验,最好在上海或香港待过的人。他建议,联络官应当接受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或大使馆武官处的领导,之后他将话题转移到香港问题:“关于重占香港,这个职位的功能是复杂的;但是我想,有必要建立与殖民地部的联系,该职位的主要功能是为中国和美国军事当局提供有关香港设施的情报。”<sup>②</sup>此后,薛穆与丘吉尔在中国的特别代表魏亚特(Carton de Wiart)将军以及驻华英军司令海斯(J. Hayes)将军进行了会商,并在4月17日接连向伦敦发出两封电报阐述他们的看法。薛穆在电报中说,美国人关于设立英国联络官的建议引发了他们“一连串的想法”。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认为,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中国和美国的军队会比中国政府先到达日本占领的地区,尽管如此,美国人会派遣行政官员随同军队的前进指挥所前往收复地区,因此,英国也应该准备这样做。薛穆表示对中国军队的进攻计划一无所知,并且,在中国战区可资调配的英军太少。<sup>③</sup>因此,他建议将设立英国联络官的设想扩大成设立英国联络组跟随中美两国军队一同行动。联络组的主要任务包括提供中国战区每日情报给各相关军政单位,维护英国在华利益,为中美两国军队提供援助服务,给英国大使馆提供收复区的政治经济信息以及保护英国资产等。<sup>④</sup>此外,薛穆在17日的两封电报中均提到了香港问题,他表示自己了解伦敦方面正在研究香港问题,但并不清楚英国是否在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中安排了人员,以便及时处理有关重占香港的事务。因此,他建议应当让设想中的联络组与准备在香港登陆的军队保持密切关系。<sup>⑤</sup>两封电报中,薛穆都强调,这个方案应当先咨询美国人,再告诉中国人,虽然他估计蒋介石不会反对,但仍建议最好避免提及香港问题。<sup>⑥</sup>

殖民地部迅速对薛穆的电报作出反应,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鲁斯顿(A. Ruston)在给外交部远东事务主管史班纳(Sterndale Bennett)的信中表示,香港被中国军队占领的危险性正在增加,殖民地部已设立了以民政事务组为核心的香港计划组。大使馆建议设立英国联络组跟随中国军队进入香港,将有助于阻止中国的正规部队或游击队在香港组织政府。她认为,设立联络组的方案与香港计划组的职能并不冲突,因此,殖民地部应当支持这个建议。<sup>⑦</sup>然而,设立联络组的建议引发了另一种担心,因为香港计划组及其核心民政事务组一直是殖民地部在重占香港计划中的执行机构,一定程度上,民政事务组就是计划中战后香港政府的雏形。为了适应战争形势,殖民地部一直谋求通过陆军部对香港计划组进行军事训练,以便他们能够在非常时期迅速返回香港、建立行政。香港事务主管梅勒(N. L. Mayle)担心设立联络组后,陆军部会放弃对香港计划组的军事训练,英国政府将

①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1<sup>th</sup> April, 1945, CO 129/591/14, p. 106.

②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2<sup>th</sup> April, 1945, CO 129/591/14, pp. 95 - 96.

③ Sir H. Seymour to Mr. Denning, 17<sup>th</sup> April, 1945, CO 129/591/14, pp. 88 - 89.

④ Sir H. Seymour to Mr. Denning, 17<sup>th</sup> April, 1945, CO 129/591/14, pp. 89 - 90.

⑤ Sir H. Seymour to Mr. Denning, 17<sup>th</sup> April, 1945, CO 129/591/14, p. 91.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7<sup>th</sup> April, 1945, CO 129/591/14, p. 104.

⑥ Sir H. Seymour to Mr. Denning, 17<sup>th</sup> April, 1945, CO 129/591/14, p. 92.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7<sup>th</sup> April, 1945, CO 129/591/14, p. 104.

⑦ Miss Ruston to Mr. Bennett, 25<sup>th</sup> April, 1945, CO 129/591/14, pp. 1 - 2.

依靠设想中的联络组去处理重占香港的问题。此外,梅勒还对薛穆在电报中用“解放香港”(Liberation of Hong Kong),而不是用“重占香港”(Reoccupation of Hong Kong)的表述感到遗憾。<sup>①</sup>经过协商后,薛穆建议联络组中的英国军官可以接受行政训练,为重占香港并建立行政机构作准备。殖民地部最终决定还是赞同重庆大使馆的提议。<sup>②</sup>

1945年7月23日,外交部、殖民地部、陆军部以及香港计划组召开联席会议,经过商讨认为,既然香港处于中国战区内,那么必须要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才能派遣英方人员跟随中国军队接收香港,从而建立行政机构,恢复英国的统治。但如果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势必会引发中方提出有关香港未来地位的谈判。因此,英国政府对如何提出这个要求犹豫不决。<sup>③</sup>基于这样的考虑,有关设立联络组跟随中国军队行动的建议迟迟未能落实,外交部同意先在驻华美军司令部中任命一名英国军官作为联络官,之后再考虑设立联络组。<sup>④</sup>

#### 四、出兵香港建议的形成过程

1945年8月初,日本有可能在短期内崩溃的迹象开始显露,这增加了殖民地部对于香港问题的焦虑感。8月3日,殖民地部会同外交部、陆军部和特别行动处(SOE)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准备应对香港出现的突发情况。会议设想了三种可能性:1. 英国或美国太平洋舰队从海上登陆占领香港;2. 中国军队在美军协助下由陆路占领香港;3. 不受蒋介石领导的中国非正规部队占领香港。<sup>⑤</sup>对于前两种可能性,殖民地部准备派出香港计划组“在恰当的时间”随同军队进入香港。但什么时候是“恰当的时间”?之前又如何向中国军队提出这个要求?殖民地部并没有详细方案,只是表示要继续深入研究。殖民地部最为担心的是第三种可能,即中国的非正规部队占领香港,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是日本突然宣布投降,而蒋介石的军队来不及到达香港。对于这种情况,殖民地部建议,一旦出现日本即将全面崩溃的情况,军方应当立刻派出舰队驶往香港。香港计划组将随同舰队出发,或在舰队出发之后前往香港。<sup>⑥</sup>殖民地部的建议颇为重要,这表明英国政府开始把派遣自己的军队重占香港提上议事日程。

针对8月3日的联席会议,殖民地部开始研究重占香港的具体预案。8月4日,殖民地部助理常务次官贞特(Edward Gent)在致常务次官盖特(George Gater)的报告中一开头就写道:“我们必须接受现在的情况,军事形势将香港置于蒋委员长的战区,他的参谋长是一名美国将军,美国协助中国组织并训练了军队,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局面。”<sup>⑦</sup>贞特还说,准备让香港计划组及其核心民政事务组接受陆军部的军事训练,使其能够迅速在香港实施军事管制(Military Administration)。至于如何与中方沟通,让香港计划组在中国军队占领香港的情况下恢复英国的统治,贞特表示,殖民地部曾建议外交部利用美国人对中国施压,即在波茨坦(Potsdam)会议上寻求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的帮助。但至于结果如何,外交部事后并没有向殖民地部反馈。接着,贞特指出,现在香港存在着危险性,即在日本突然崩溃的情况下,中国的非正规部队会占领香港,并可

① Report by Mr. Mayle, 18<sup>th</sup> May, 1945, CO 129/591/14, pp. 6-7.

② Miss Ruston, 28<sup>th</sup> May, 1945, CO 129/591/14, 1945, p. 9.

③ Memorandum by Bennett, 25<sup>th</sup> July, 1945, FO 371/46251.

④ Report by Miss Ruston, 25<sup>th</sup> July, 1945, CO 129/591/14, p. 12. Minutes, 3<sup>rd</sup> August, 1945, CO 129/591/14, pp. 23-36.

⑤ Possible Collapse of Japan before the Re-occupation of Hong Kong, 3<sup>rd</sup> August, 1945, CO 129/591/16, p. 94.

⑥ Possible Collapse of Japan before the Re-occupation of Hong Kong, 3<sup>rd</sup> August, 1945, CO 129/591/16, p. 94.

⑦ Mr. Gent to Sir Gater, 4<sup>th</sup> August, 1945, CO 129/591/16, p. 2.



能建立政府。在这种形势下,香港有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与劫掠。这样一来,英国不仅会失去威信,也会为重新恢复在香港的统治遭遇极大困难。因此,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出现,贞特建议由殖民地部会同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和海军部作出安排,一旦获悉日本即将投降,立即派遣二至三支快速舰队驶往香港。贞特请示是否可以由他为这个方案准备一份文件。<sup>①</sup>

而与此同时,中国战区拟订从雷州半岛登陆,进攻广州、香港的军事方案被英方获悉。1945年8月3日,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向海军部报告,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将军决定攻占雷州半岛,夺取湛江作为补给港。一旦登陆成功后,预计8月份将有3万吨物资运到湛江,以后,每月将增加到6万吨,为下一阶段中国军队攻占广州和香港作准备。电报强调,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已向军官们下达了“雷州半岛、广州和香港军事行动方案”。<sup>②</sup>这个军事行动方案即是前文所述由驻华美军作战司令部于7月中旬提出的方案。8月7日,英国军方开会商讨对策,在讨论中,参谋总长布鲁克(Alan Brooke)元帅认为,攻占雷州半岛后,中国军队不会迅速夺取香港,因为那里的日军兵力非常强大。在蒙巴顿将军就此计划作出安排之前,英美两国军方应当达成一个官方协定。空军参谋长波特尔(Charles Portal)元帅认为,如果决定派遣英国部队参加重占香港的任务,应当由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安排在马尼拉进行准备。首相的参谋长伊斯梅(Hastings Ismay)将军认为,应当告诉美军,任何有关英国属地的军事行动,英国军队都要参加。会议决定,有关香港问题还需要向殖民地部咨询,以便采取相应对策。<sup>③</sup>

殖民地部对此迅速作出回应,表示他们正在为占领香港后,重新恢复英国在那里的统治作准备;并建议尽快让香港计划组进入香港,该计划组既可以随同中国陆军从雷州半岛出发,也可以跟随美国太平洋舰队从海上登陆香港。殖民地部表示,目前英国政府与蒋介石之间没有就此进行任何安排。即便在占领香港前达成协议,仍会有操作困难,而且中国军队也许会采取行动,给英国人重返香港制造障碍。因此,殖民地部希望香港计划组能跟随美国太平洋舰队从海上登陆,并表示,如果英国海军参与登陆香港的军事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sup>④</sup>殖民地部强调:“恢复英国在殖民地的利益是我们的事情,而不是美国和中国的事情,所以,殖民地部急切希望尽可能让英国参与这次军事行动。”<sup>⑤</sup>

以上说明,在8月10日之前,即日本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信息被证实之前,殖民地部和军方已为重返香港定下了基调,即无论香港由中国军队占领还是出现其他任何情况,英国都应当派遣军队从海上登陆香港,出兵香港的建议实质上已经形成。对于英国来说,三年多之前曾因战败而失去香港,派兵收回似乎是最能挽回尊严的一种方式。事实也证明,它是保证英国顺利重返香港并成功恢复在那里的统治的最有效、也是最可靠的办法。

## 结 论

1945年8月29日拂晓,夏忒(Cecil Harcourt)少将率领英国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特遣分队抵达香港海面,30日上午,海军陆战队在布朗(Brown)中校的指挥下登陆港岛。<sup>⑥</sup>在撤离三年又八个

① Mr. Gent to Sir Gater, 4<sup>th</sup> August, 1945, CO 129/591/16, pp. 2-3.

② C. in C., B. P. F. to Admiralty, 3<sup>rd</sup> August, 1945, CO 129/591/15, p. 10.

③ Future Operations from China, Note by the Secretary, 8<sup>th</sup> August, 1945, CO 129/591/15, p. 9.

④ Future Operations in China, Colonial Office views ref. J. P. (45) 200 (S) (T. of R.), CO 129/591/15, pp. 4-5.

⑤ Future Operations in China, Colonial Office views ref. J. P. (45) 200 (S) (T. of R.), CO 129/591/15, p. 5.

⑥ War Diary by Harcourt, 30<sup>th</sup> August, 1945, CO 129/591/18, p. 28.

月之后,英国人兵不血刃重占香港。此前,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中英爆发历时两周的香港受降之争,英军登陆香港之时,风波尚未完全平息。其实,无论外交纷争进展如何,英国军方并不关心,依旧按照既定的出兵方案实施,重占香港的行动未受影响。

太平洋战争期间,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中英两国是不甚融洽的盟友;在香港问题上,他们又是剑拔弩张的对手。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虽在新约谈判之时遭受挫折,但以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仍是其处置香港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原因何在?其一,新约谈判之中,外交系统传递给蒋介石的信息是:英国人愿意归还香港,只是时机不成熟。顾维钧曾向蒋介石强调,他认为英国打算真心诚意归还香港,缔结新约是“送上门来的礼”,然而“该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因此,中国应当“先收下这第一份礼为宜,可以在收礼的同时暗示一下我们在等待着第二份礼的到来”。<sup>①</sup>其二,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同情中国。仅就舆论而言,在1942年6月的民意调查中,有56%美国民众认为,英国从殖民地中获得了不光彩的利益,英国人也应当算作压迫者。<sup>②</sup>并且,“自由港”的方案也正是罗斯福先提出的,美国的态度是中国政府对英谈判的底牌。不过,上述两个因素未必能够起作用。第一,顾维钧纯属判断失误,英国政府内部对于香港问题虽然有不同声音,但并没有任何政府官员主张在战时就讨论归还香港的问题,也没有人主张在战后可以主动放弃香港。第二,早在1942年八九月间,英国就已经意识到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倾向于支持中国。但伦敦认为,即便是这样,英国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英国有着更深层的忧虑,即担心战后美国会将其从远东排挤出去。<sup>③</sup>

英国的策略很明显,一方面拒绝在外交上与中国讨论香港问题,回避美国的施压;一方面为重返香港、恢复统治作积极准备。相较于外交部,殖民地部和军方在策划重占香港的问题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英国最担心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先于英军占领香港,而这一情况恰恰符合蒋介石所谓“为最之手段”,即中国从日军手中夺取香港,造成先占的既成事实。但是,1944年开始,日军在中国大陆战场的一系列作战行动延迟了中国军队的战略反攻,攻略广州、香港的作战计划未及实施即因日本突然投降而终止。可以设想,果若中国军队占领了香港,英国则很难掌握主动权。如前文所述,尽管英国殖民地部和军方考虑的重点就是在中国军队占领香港的前提下如何恢复统治,但就其措施而言,虽然具体,不过依然面临重重困境。在中国军队中派进去一个联络组是不能发挥多大作用的,此后,虽然伦敦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出兵香港,但在中国军队占领之下如何组织登陆、恢复统治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此可见,1943年中英新约签订后,中国或许仍有机会在香港问题上有所作为。这个机会可能正是在于蒋介石所言“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取回”。然而,计划终归是计划,在瞬息万变的历史湍流之中,这个机会最终失之交臂。

[作者孙扬,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讲师]

(责任编辑:徐志民)

<sup>①</sup>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17—18页。顾氏在回忆录中曾两次提及27日他与蒋介石的会面,对具体细节的描述略有差异。

<sup>②</sup>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 - 1945* (London: Hamilton, 1978) p. 209.

<sup>③</sup> 有关1942年八九月间英国政府内部对香港政策讨论的资料,可参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1777和FO 371/31801,详细经过本文不赘述。